

春秋戰國時代的系統戰爭： 三種現實主義外交政策理論的比較

薛健吾*

摘要

中國的快速崛起是否將對東亞區域安全以及中美關係帶來負面的影響，是當代國際關係研究中最重要問題之一。當代的三大現實主義外交政策理論——攻勢現實主義、新古典現實主義和守勢現實主義，普遍對於中國的崛起是否會帶來衝突的發生抱持著較為悲觀的看法，但是對於這個衝突到底是如何產生的因果機制，卻有著不同的預測。本文考察在歷史上極為接近現實主義「無政府狀態」假定的東周時代所發生的兩場大戰——春秋末年的「齊吳之戰」與戰國末年的「秦滅六國之戰」，並且發現，在一個非常接近現實主義「無政府狀態」假定的環境之下，各國的「擴張理由」和「聯盟政策」，最符合「新古典現實主義」的預測。本文的發現對於以現實主義的外交政策理論來理解中國崛起對國際衝突的影響具有重要的啟示意義。

關鍵詞：中國崛起、守勢現實主義、攻勢現實主義、無政府狀態、新古典現實主義

作者誠摯感謝本文的幾位審查人和學報的編委老師們給予本文的寶貴修改建議，以及林炫向老師和陳麒安老師對於本文初稿的專業評論，還有蔡文軒老師與張登及老師在訪談中惠予作者的意見分享。作者在與諸位學術先進的交流之中受惠良多，在此深表感謝。文中若有錯誤之處，皆為作者本人之責任。

* 國立政治大學東亞研究所副教授，E-mail: c.hsueh@nccu.edu.tw

收件日：2018年9月11日；修正日：2019年7月14日；接受日：2020年4月15日

Systemic Wars in the Spring and Autumn Period and the Warring States Period: A Comparison Between the Three Realism Foreign Policy Theories

Chien-Wu Alex Hsueh*

Abstract

How the rise of China may affect regional security in East Asia and the Sino-U.S. relationship is one of the most important questions in contemporary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studies. All the three main contemporary realism foreign policy theories—offensive realism, neoclassical realism, and defensive realism—hold pessimistic attitudes towards the impact of China’s rise, but differ in the mechanisms they infer to explain how China’s rise will lead to international conflict. In this article, I investigate two systemic wars that occurred in the Spring and Autumn Period (the war between Qi and Wu) and the Warring States Period (the war between Qin and the other six warring states) with historical backgrounds that are similar to the realism’s “anarchy” assumption when compared with all the other historical periods in China. I find that it is neoclassical realism, not offensive realism or defensive realism, which has the most explanatory power in a world of ideal-type anarchy. This finding has important theoretical implications when we try to predict the influence of China’s rise on international conflict with the applications of realism theories.

Keyword: Anarchy, China Rising, Defensive Realism, Neoclassical Realism, Offensive Realism

* Associate Professor, Graduate Institute of East Asian Studies, National Chengchi University. E-mail: c.hsueh@nccu.edu.tw

Manuscript received: 2018.9.11; Revised: 2019.7.14; Accepted: 2020.4.15

張儀已學遊說諸侯。嘗從楚相飲，已而楚相亡璧，門下意張儀，曰：「儀貧無行，必此盜相君之璧。」共執張儀，掠笞數百，不服，醒之。其妻曰：「嘻！子毋讀書遊說，安得此辱乎？」張儀謂其妻曰：「視吾舌尚在不？」其妻笑曰：「舌在也。」儀曰：「足矣。」
——司馬遷《史記·張儀列傳》

壹、緒論

中國的快速崛起是否將對東亞區域安全以及中美關係帶來負面的影響，可以說是當代國際關係研究中最重要問題。根據主流國際關係理論的看法，由於中國與各主要大國之間具備了各種現實主義的悲觀理由、缺乏各種自由主義的樂觀理由，再加上許多負面的建構主義互動經驗 (Friedberg, 2005; Shambaugh, 2012)，以及難以確定彼此的真實意圖 (Rosato, 2015)，因此學界對於中國的崛起是否將在東亞地區或是中美之間帶來衝突的結果，大多抱持著較為負面的看法。

在Waltz (1979) 的新現實主義理論的激發之下，Rose (1998) 和Walt (2002) 在他們的文獻回顧中都認為，當代現實主義的學者們已將Waltz的「國際政治理論」透過新變數的增加而發展成為三大現實主義「外交政策理論」：攻勢現實主義、守勢現實主義與新古典現實主義。¹雖然現實主義對於中國崛起的看

¹ 關於這三大現實主義外交政策理論的「分類」和「定位」，在文獻中仍有爭議，例如 Narizny (2017: 170, 182-183) 就分析道：「若根據 Rose (1998) 的分類，攻勢、守勢和新古典現實主義是屬於三種截然不同的外交政策理論派別；若根據 Taliaferro (2001) 的分類，則攻勢和守勢現實主義不僅可以是『結構現實主義國際政治理論』的兩個不同分支，同時也可以是『新古典現實主義外交政策理論』的兩個不同分支……若根據 Ripsman, Taliaferro, & Lobell (2016) 的分類，則在應用新古典現實主義之前，研究者必須先選擇一個理論為基礎，然後再解釋國家之所以為什麼會出現不符合該理論所預測的行為，如此一來，新古典現實主義就變成了該理論（可以是攻勢、守勢或是任何理論）的次分支」。此外，唐世平 (Tang, 2010: 165-178) 對於各個主要理論應該是屬於攻勢、守勢或是新古典現實主義的分類也有其獨樹一格的論點。最重要的是，各個理論的主要創立者本人，在其後續的文章中，也都認為自己的理論明顯與其他兩種理論是不同的派別、不屬於某種理論的分支，而且也經常在其研究中將自己的理論與其他兩種理論的解釋力作出比較。本文的目的，並不在於釐清這三大理論在方法論或本體論上的相對位置，而是在於比較各個理論的解釋力。在文獻中對於這三種外交政策理論的定位尚未有定論的情況之下，Rose (1998) 和 Walt (2002) 的分類、各個作者對於自己理論的獨立性的辯護，再加上各個作者在自己的著作中幾乎都有將其理論與其他理論的解釋力做出比較，以上這些觀點都提供了我們同時比較這三種理論的文獻基礎。

法傾向於較為悲觀的結果，但這三大派別對於這個「悲劇」是如何形成的、又該如何管理以避免「悲劇」的產生，卻有著截然不同的看法。簡單來說，較為樂觀的守勢現實主義認為，只要安全困境能夠受到控管，中國的崛起不必然帶來衝突，但目前的安全困境愈加嚴重 (Liff & Ikenberry, 2014)；較為中庸的新古典現實主義認為，中國的崛起是否帶來衝突，取決於相對權力變化如何透過中國和他國的領導人的解讀與動員以轉變成具體的外交政策產出 (Ripsman et al., 2016)；而在眾多負面的看法之中，以Mearsheimer (2001) 所提出的「攻勢現實主義」最為悲觀，其認為，由於國家追求的是安全，且他國的意圖既無法探知，也不固定，所以達成安全最好的辦法就是使自己成為體系當中最強大的國家，當每個大國都如此行事時，崛起的中國將會無可避免地與其他大國走向大規模衝突的結果。

很顯然地，雖然同樣都是屬於現實主義的家族，但這當代三大現實主義外交政策理論對於中國崛起造成國際秩序的可能影響卻有著南轅北轍的看法。許多學者試圖根據三種不同的理論來預測中國崛起後與大國之間的關係，或者是根據中國在近年國力增加之後的衝突模式來判斷中國的行為較為符合哪一種理論的預期。例如，在攻勢現實主義的部分，Mearsheimer (2014: 360-411) 認為，在無政府狀態、大國追求生存的邏輯下，中美在未來大規模的衝突將難以避免；Jung & Lee (2017) 也發現，中國確實隨著國力的增長，而出現更多的強勢作為以及與大國之間的爭端，符合攻勢現實主義的預測。在新古典現實主義的部分，Schweller (2018) 認為，中美相對權力變化所帶來的影響，在很大程度上應該要取決於雙方內部在國家主義 (nationalism) 情緒上的消長，不一定會帶來衝突的結果；He (2017) 也發現，從中共建政以來至今，中美關係的演變很大程度上取決於雙方領袖對彼此在安全威脅和經濟利益上的不同認知。在守勢現實主義的部分，Tang (2010, 2013) 認為，現在的國際體系已經由過去的攻勢現實主義的時代演進成當代的守勢現實主義的時代，因此中美之間不太可能發生過去那樣的大規模衝突；Raditio (2015) 檢視了中國自改革開放後至今的衝突行為，得到了中國的行為基本上比較符合守勢現實主義的預測的結論。

雖然上述對於當代中國與其他國家之間在「衝突行為」上的研究有著矛盾的發現，但是，嚴格來說，這些不同的現實主義理論在本質上最主要想要解釋的，其實是大國之間的「戰爭行為」，而中國崛起至今，尚未與任何大國發生大規模的戰爭，因此目前尚無法直接驗證哪一種理論的解釋最為接近現實，不過，我們仍然可以在思想實驗場中，去建構一個環境來模擬衝突可能將如何發生。本文認為，若我們回顧在一個十分接近現實主義「無政府狀態」的情境

下，看看大國之間的行為最能夠符合哪一種理論的說法，則我們更能夠對於現實主義理論的應用得到更多的啟示。²據此，本文嘗試做出的貢獻有二：第一，將這三種現實主義外交政策理論對於國家在「擴張」和「聯盟」行為的解釋作出系統性的統整；第二，在一個非常接近現實主義「無政府狀態」假定 (assumptions) 的理想型 (ideal type) 歷史時空背景中，以相同的歷史案例，同時評估這三種現實主義外交政策理論解釋的說法，以試圖對於這三種理論的解釋力在一個極為接近現實主義假定的環境中作出最直接的比較。³本文選擇發生在東周時代中的一段極為接近無政府狀態的時期下的兩次大規模戰爭來做驗證，並且發現，在一個非常接近現實主義無政府狀態假定的理想狀態下，各國外交政策的轉變過程較為符合「新古典現實主義」的預測。這個發現對於以現實主義來理解當代中國崛起的可能影響具有重要的啟示意義。

本文的章節安排如下。在第貳節中，本文將系統性地統整出這當代三大現實主義外交政策對於國家在「擴張理由」和「聯盟政策」這兩項行為上的解釋，⁴分別根據這三種理論推導出三組待測假設 (hypotheses)，並且說明為什麼本文是以「齊吳之戰」與「秦滅六國之戰」來作為個案研究的案例選擇。第參節為對這兩個案例的個案研究，分析史料中對於各國在「擴張」與「聯盟」行為上的記載，並且發現，各國外交決策轉變的過程最為符合「新古典現實主義」的預測。第肆節的結論將討論本文的發現對於以現實主義的理論來理解中國崛

² 例如在近年的文獻中，學者吳玉山 (2018)、唐欣偉、唐豪駿 (2017: 25)、張登及、陳瑩菴 (2012: 92-93) 和楊仕樂 (2017: 78) 等人的研究，都試圖以過去歷史的案例來理解當代中國的外交行為。特別是唐欣偉 (2018)、唐欣偉、唐豪駿和楊仕樂等人的研究，也顯示出以當代的國際關係理論去檢證中國各朝代與「非標準國家實體的遊牧民族」之間的行為的可行性。

³ 這邊要特別說明的是，「無政府狀態」並不是現實主義典範的專屬假定，因為新自由制度主義學者、部分的自由主義學者、英國學派學者，以及部分的建構主義學者，都有假定「國際社會是無政府狀態」。只是因為本文的研究旨趣在於研究在無政府狀態之下國家「如何進行權力平衡、如何結盟、如何發動戰爭」，而這三個依變數是現實主義理論最感興趣的依變數，而新自由制度主義、部分的自由主義、英國學派、部分的建構主義對於這三個依變數（國家如何進行權力平衡、如何結盟、如何發動戰爭）並沒有提出清楚的假設可供檢測（因為這些典範比較多關注的是國家為何合作或是國家之間的和平如何形成，而不是國家之間為何結盟或是發動戰爭），因此本文就沒有特別去比較其他現實主義理論以外的典範。

⁴ Ripsman et al. (2016: 18) 指出，Waltz (1979) 的結構現實主義可以回答兩個一般性的問題：第一個問題涉及為什麼哪一種相對實力的分布最為穩定、最不容易引起大國之間的戰爭，第二個問題涉及各國如何選擇諸如制衡、卸責、扈從或其他等等安全戰略。這也是本文以「擴張理由」和「聯盟政策」這兩個現象來對這三大理論進行比較的理由，因為這兩個現象是這三大理論都有共同探討到的依變數。

起的啟示。

貳、理論、案例與方法

一、三種現實主義外交政策理論及其假設

在攻勢現實主義的假定中，無政府狀態是一個殘酷的、霍布斯式的弱肉強食的世界，其帶給國家的壓力都是一樣的，國家永遠無法確定要擁有多少的權力才能得到足夠的安全 (Mearsheimer, 2001: 34-35; Rose, 1998: 149, 154)，生存（追求安全）因此成為國家最重要的目標。在這個假定之下，國家獲得安全最好的方式為採取進攻性的行動以極大化地追求超過競爭對手的權力，而成為最強大的霸權國、追求相對權力的最大化即為確保安全最好的方法 (Snyder, 1991: 9-13)，因此沒有一個國家的目標是維持現狀 (Labs, 1997; Mearsheimer, 2001: 21, 410)，國家的擴張意圖將隨著「能力」(capability) 的增加而增加，只要能力足以擴張，國家就會選擇擴張 (Lynn-Jones, 1998: 160-168)。這種由「無政府狀態」所帶給國家的巨大生存壓力，直接地影響到了各國外交政策的產出，因為國家之間無法得知對方的意圖，所以各國若想要減低恐懼，最保險的情況就是作出最壞的打算 (Tang, 2008)，把握所有可以增加自己的相對權力的機會，並且鼓勵其他國家去對抗強權，而自己最好是推諉責任，如此一來，權力平衡將難以形成，也因此鼓勵了各國採取侵略的行為 (Walt, 2002: 207)。在兩極體系下，因為沒有其他的大國來承擔責任，所以大國會選擇制衡威脅，較為容易形成均勢；而在多極體系下，除非直接與侵略國接壤，否則大國有強烈的卸責誘因，讓其他大國去制衡侵略而自己最好是保留實力，所以會選擇推卸制衡的責任，均勢將更不容易形成 (Mearsheimer, 2001: 267-333)。國家對外擴張的原因來自於本身實力的增強 (Zakaria, 1992: 191) 與避免最壞的情況發生的恐懼。大國不會對敵人採取綏靖或是扈從的政策，因為那是讓出權力、自取滅亡的戰略 (Mearsheimer, 2001: 162-164)。因此，由完全著重在體系變數的「攻勢現實主義」所推導而出的外交政策行為假設為：

假設1A（攻勢現實主義對國家擴張原因的推論）：只要能力提升，且能用合理的代價達成目的，國家就會擴張。

假設1B（攻勢現實主義對極性與權力平衡難易度的推論）：在兩極體系下比在多極體系下更容易出現權力平衡的行為；在多極體系下比在兩極體系下更容易出現推卸制衡責任的行為。

假設1C（攻勢現實主義對國家結盟政策的推論）：大國總是加入弱的一方，不會去扈從強者。⁵

與攻勢現實主義不同，守勢現實主義假定無政府狀態是一個相對仁慈的世界，其帶給國家的壓力可以是多樣的，且國家的「安全」是相對充足的 (Rose, 1998: 149)，因此，雖然在無政府狀態下國家的目標依然為生存（追求安全），但獲得安全最好的方式以採取防禦性的行動來追求安全與現狀即可 (Snyder, 1991: 9-13)。追求權力會引起其他國家的制衡，或是會引發因為安全困境所造成的衝突，因此是危險的舉措 (Tang, 2010: 21-22)。國家選擇對外擴張的主要原因來自於不安全感，所以國家只有在對外擴張能增加安全，或是為了安全考量而不得不對外擴張時，才會因為追求安全的極大化而選擇擴張，而大前提是國家本身必須具有足以支持對外擴張的能力 (Lynn-Jones, 1998: 170)。雖然國家之間無法得知對方的意圖，但一般來說，防守比進攻容易，且仍然有許多信心建立措施可以消除不確定性和恐懼 (Tang, 2008)，所以除了在極端危急的情況下國家會採取聯盟（外部制衡，external balancing）的策略去平衡威脅之外，大部分的時間國家都會採取防守的策略或是自我圖強（內部制衡，internal balancing）的策略 (Parent & Rosato, 2015; Walt, 2002: 205)。系統帶給國家的誘因（體系使然的行為）或是國家內部的因素（非體系使然的行為）兩者都可單獨影響到外交政策的產出：國家在具有擴張能力時會選擇對外擴張的三大主要原因包含了「不安全感」(Zakaria, 1992: 191)、「未獲得妥善管理的安全困境」(security dilemma) (Glaser, 1997; Herz, 1950; Jervis, 1978; Liff & Ikenberry, 2014; Rosato, 2015)，以及「支持對外擴張的政治聯盟取得了外交政策上的主導權」(Snyder, 1991)，前兩者是出自於系統帶給國家的誘因，後者是出自於國家內部的因素。大國不會選擇扈從強者，因為獲得權力只是手段，安全才是國家的最高目標 (Walt, 1985: 15-18; Waltz, 1979: 126-127)。因此，由認為體系變數與個體變數都有單獨的影響力，且後者比前者重要的「守勢現實主義」所推導而出的外交政策行為假設為：

假設2A（守勢現實主義對國家擴張原因的推論）：只要國家的不安全感提升，或是安全困境未獲得妥善的管理，或是支持對外擴張的政治聯盟取得了外交政策上的主導權，國家就會擴張。

⁵ 本文中所稱的「扈從」(bandwagoning)，其定義和測量方式與這三大現實主義學者所界定的相同：只要國家加入相對實力較強的那一方就叫做「扈從」；反之，如果國家加入相對實力較弱的那一方，就是對當時相對實力較強的那一方的「抗衡」。

假設2B（守勢現實主義對極性與權力平衡難易度的推論）：只有在極端危急的情況之下國家會採取外部制衡（與他國結盟去制衡強者）的策略，而大部分的時候國家會採取被動防守或是內部制衡（自我圖強）的策略。在兩極體系下比在多極體系下更容易出現權力平衡的行為。

假設2C（守勢現實主義對國家結盟政策的推論）：大國總是加入弱的一方，不會去扈從強者。

有別於攻勢現實主義和守勢現實主義都假定無政府狀態是一個明顯可辨的事實，在新古典現實主義的假定中，無政府狀態對國家來說是模糊且難以解讀的，國家是否已經擁有足夠的安全須靠各國自己對有限的資訊的解讀與判斷 (Rose, 1998: 151, 154)，因此，「國際體系的權力分布」並無法在因果關係上直接連結到「個別國家的外交政策選擇」，必須要有一些中介變數 (intervening variable) 在連結國際系統的壓力與決策者的外交政策產出兩者中間扮演著重要的角色，才能夠在因果關係上作出完整的解釋。這些中介變數可能在「威脅評估」、「目標與策略選擇」以及「攫取資源、動員人民、策略執行」這三個國內的政治過程中影響到外交政策的產出 (Lobell, Ripsman, & Taliaferro, 2009: 31-32; Ripsman et al., 2016: 58-79)。國家所追求的目標隨著能力的不同而有所不同，有的國家傾向維持現狀，有的國家想要改變現狀 (Schweller, 1994; Zakaria, 1998: 19)，而獲得比現狀更多的安全或是其他利益最好的方法，就是根據自己擁有的實力的多寡來盡力控制和形塑外部的環境，以提高自身的外部影響力 (Rose, 1998: 152)。正因無政府狀態與相對權力帶給國家的生存威脅程度是模糊且難以測量的，所以才必須透過決策者的感知、解讀與運作來形成進攻或防守的外交政策選擇 (Christensen, 1997; Christensen & Snyder, 1990; Schweller, 1994)。面對相對權力轉變的安全威脅，如果最佳的策略回應清楚明確的話，新古典現實主義可以解釋為何國家沒有採取應有的策略；反之，如果最佳的策略回應不清楚明確的話，新古典現實主義可以解釋國家如何在眾多替代方案中作出選擇 (Lobell et al., 2009: 280-287)。國家對外擴張的原因來自於認為系統提供了足夠的機會，而且自己本身也具備了足夠的實力和意願，因此國家的結盟政策也要看「國家本身的目標」、「系統給予的機會」和「國家自身的能力」三者而定 (Schweller, 1994)。因此，由認為體系變數最重要但個體中介變數為必要的「新古典現實主義」所推導而出的外交政策假設為：

假設3A（新古典現實主義對國家擴張原因的推論）：如果決策者判斷系統提供了足夠的機會且國家本身也已經具備了足夠的實力，國家就會擴張。

假設3B（新古典現實主義對極性與權力平衡難易度的推論）：極性對於權力平衡的難易或是結盟的選擇都沒有直接關係，必須透過中介變數來決定。

假設3C（新古典現實主義對國家結盟政策的推論）：在權力分布沒有改變的情況之下，各國根據對局勢的解讀的轉變而轉變結盟的對象。

在進入本文的研究設計之前，這邊有兩項的說明是必要的。第一個說明是，由於新古典現實主義的假設較為籠統，因此其檢證的關鍵在於必須要看到四件事情：第一，當時各國的相對權力必須沒有明顯的轉變；第二，必須發生導致國家對局勢的解讀轉變的事件；第三，國家的「擴張理由」與「聯盟政策」在前面兩點都成立之後出現轉變；第四，各國的行為轉變不是因為「第二點」以外的其他的理由所導致的。唯有在事件發生的過程同時符合這四點要求的情況之下，才能判斷新古典現實主義的假設確實得到了支持。

第二個說明是關於這三種理論的比較基準點是否公平的問題。這邊可能有的疑問有三點：第一，新古典現實主義使用到的自變數最多，所以本來就應該對依變數解釋得最好；第二，新古典現實主義的出現時間最晚，所以理應比其他兩個理論的考量更周全；第三，新古典現實主義本來就是在修正其他兩個理論的不足之處，所以本來就應該要解釋得更好。不過，本文認為，基於以下原因，這三種理論的比較基準點仍然是公平的：第一，以「聯盟政策」為例，這三種理論使用到的自變數的數量都一樣是兩個。攻勢現實主義的兩個自變數是「權力分布（極性）」和「與侵略國是否相鄰」；「守勢現實主義」的兩個自變數是「權力分布（極性）」和「被威脅的程度」；「新古典現實主義」的兩個自變數是「權力分布」和「國家對權力分布的解讀方式」。因此，「新古典現實主義」事實上並未比其他兩個理論使用更多的自變數。第二，在這三個理論中，攻勢現實主義興起的時間應該是最晚的，一直到Mearsheimer在2001年出版《大國政治的悲劇》(*The Tragedy of Great Power Politics*)一書之後，攻勢現實主義才正式有了系統性的論述，守勢現實主義(Snyder, 1991; Zakaria, 1992)和新古典現實主義(Christensen, 1997; Christensen & Snyder, 1990; Rose, 1998)都在1990年代初期、中期就出現，所以在理論出現的時間點上來說，應該是攻勢現實主義要更為細緻；或者是，在2010年唐世平出版《我們時代的安全戰略理論：防禦性現實主義》(*A Theory of Security Strategy for Our Time: Defensive Realism*)之後，守勢現實主義也出現了有系統的統整論述。也就是說，至少在理論興起的時間點上，新古典現實主義相較於攻勢或是守勢現實主義，應該沒有明顯的時間優勢。或許更為重要的是，攻勢和守勢現實主義在時間點更為後

面的著作之中，顯然也並不認為「國家對於資訊的處理或是動員」這類單元層次的變數具有足夠的重要性而必須被納入理論建構之中，可見時間點較為後面的學者們也並不都認為新古典現實主義是明顯優越的理論。第三，如果本研究的寫作方式是如Narizny (2017: 182-183) 所言，「若根據Ripsman et al. (2016) 的分類，則在應用新古典現實主義之前，研究者必須先選擇一個理論為基礎，然後再解釋國家之所以為什麼會出現不符合該理論所預測的行為，如此一來，新古典現實主義就變成了該理論（可以是攻勢、守勢或是任何理論）的次分支」，那麼新古典現實主義確實勝之不武，因為這樣就變成是「事後檢證」，也就是先知道結果，再來用新古典現實主義解釋國家的行為為什麼不符合攻勢或是守勢現實主義的預測。不過，本文的檢證是採取「事前檢證」的方式，以各理論所演繹出來的假設為基礎，來檢視「事前的擴張理由和結盟政策」更能符合哪一個假設，是採用事前的演繹法而不是事後的歸納法，所以對於這三種理論的比較應該是在一個公平的基礎上出發的。

在本節的第二個部分，本文將說明案例的選擇與研究設計，以測試在十分接近現實主義理論假定的理想情境之下，到底是哪一種現實主義理論的解釋最能夠與歷史的記載相符合。

二、案例的選擇與研究方法

本文所選擇的探討案例為發生在東周的兩次大戰，包含了在西元前473年餘波才算全部結束的「齊吳之戰」，以及在西元前221年結束的「秦滅六國之戰」。之所以選擇發生在東周時代的這兩場大戰來比較三種現實主義的外交政策理論，主要有以下三個理論上和研究設計上的理由。

第一個理論上的理由在於，本文是根據文獻中的理論，來選擇最符合現實主義運作的前提條件的案例。各種現實主義的理論都專注於解釋「大國之間的戰爭」，而在東周時代，有史料記載的大國之間的戰爭高達數百場，因此如何選擇案例就變成了一個重大的關鍵。在「齊吳之戰」中，大戰的結果是「存魯、亂齊、破吳、強晉而霸越」（《史記·仲尼弟子列傳》：47），⁶不僅當時的所有大國皆有參戰，也是東周時代以來第一次有大國（吳國）被滅國的戰

⁶ 為求方便讀者索引，在本文中所有對古籍的引用全部都來自於「中國哲學書電子化計劃」的網頁 (<http://ctext.org/zh>) (Sturgeon, 2011: 中國哲學書電子化計劃)。所有引用古籍的段落號碼皆以該網頁的段落編碼為準。

爭；在「秦滅六國之戰」中，六國相繼被滅，也因為中原地區成為秦國大一統的局面而結束了戰國時代。這兩場大戰都改變了當時的大國格局，其對後世的歷史意義和影響力都具有顯著的重要性。本文根據Copeland (2000) 的案例選擇建議，選擇了在這一段期間中、在數百場大國戰爭的樣本之中，唯一的兩場「所有的大國都參與，而且也有大國被滅國」的戰爭，他的理由是，選擇這種「國家以最高的強度來進行動員」的大戰，是因為這是最高層次的衝突，是對體系中最強大的國家造成威脅的全面戰爭，因此更能確證其對於大國的決策來說具有重要性，更能有效地檢證相對實力的分布到底對於國家的決策過程帶來的影響 (Copeland, 2000: 27-28)。

第二個理論上的理由在於，這兩場大戰發生時的國際環境，十分接近現實主義者所說的「無政府狀態」，是一個趨近於理想型的現實主義國際體系，因此堪稱是一個可以對各種現實主義理論的解釋力進行直接比較的絕佳實驗場。東周時期，周天子所掌控的中央政府持續衰弱，並且事實上也已經失去統御各封建諸侯的權力，諸侯國之間彼此征伐、相繼爭戰，已是東周時代的常態。在這段時期中，雖然偶有霸主非常短暫地透過「諸侯會盟」來維持國際秩序，⁷但是在大多數的時間中，這種霸主式的國際盟約並不存在，或是名存實亡。⁸如Holsti所說，「春秋戰國體系是一個由國家構成的體系，在這個體系中，沒有安全感的政治實體不斷地互相攻擊，以征服（因而消滅）鄰國為其政治目標」(Holsti, 1999: 284)，「條約通常在歐洲能夠被遵守，但在春秋戰國時期只不過是『權宜措施』」(Holsti, 1995: 47)。也就是說，在東周的絕大部分時期，國際體系是一個高度的無政府狀態，各國必須自己追求自己的安全。根據司馬遷的統計，單單在春秋時代，就有「弑君三十六，亡國五十二，諸侯奔走不得保其

⁷ 如在春秋時代，齊桓公、晉文公、秦穆公、宋襄公、楚莊王、鄭莊公、吳王闔閭、吳王夫差和越王勾踐曾在不同的史料之中被認為是曾經召集過諸侯會盟的霸主。史書中雖有「春秋五霸」之說，但對於「五霸」各是指哪五個諸侯則是眾說紛紜，甚至亦有「五霸」中的「五」並非「實數」而是指「多數」的說法。在各個史料中，只有齊桓公和晉文公都被認為是五霸之一。

⁸ 如西元前 651 年，齊桓公在葵丘大會諸侯，與天下諸侯成立共同輔佐周天子的盟約，然而齊桓公卒於前 643 年，距離葵丘之盟僅僅 8 年。接下來，晉文公主持了踐土之盟（前 632 年），然而晉文公卒於前 628 年，距離踐土之盟僅僅 4 年。然後，越王勾踐主持了徐州會盟（前 472 年），然而越王勾踐卒於前 464 年，距離徐州會盟僅僅 8 年。可見這些在某種程度上能夠維持一定國際秩序的霸主其為期均甚為短暫。雖然根據《左傳》的記載，在春秋時期諸侯會盟的次數可能高達二百餘次，然而諸侯並非每次會盟的目的都在於輔佐周天子、促進各國的和平，大多數的會盟其實是以商討如何使用武力奪取他國為目的。

社稷者不可勝數。」（《史記·太史公自序》：16）；而在戰國時代，天下更是處於「周室微，諸侯力政，爭相併。」（《史記·秦本記》：51）的狀態。根據Lewis (1990: 36) 的統計，在僅僅259年的記事中，《左傳》就記載了540場列國戰爭和130多場大型內戰。根據許田波的統計，在西元前656～前473年的春秋時代，不到200年的時間裡面，有大國捲入的戰爭就有91次之多，而在西元前473～前221年的戰國時代，250年間有大國捲入的戰爭就有166次之多 (Hui, 2005: 242-248)，這些數字還不包括小國與小國之間的戰爭。根據唐世平的統計，整個西周和東周時期，有800多個國家被消滅，平均每個世紀都有將近100個國家被滅亡，平均每一年都有一個國家從地圖中消失，「無論我們怎麼看，古代中國的戰爭都是普遍、殘忍和全面的」（唐世平著，董杰旻、朱鳴譯，2017：124-125）。不論是從戰爭的數目或者是從被滅亡的國家的數目來看，東周當時的國際環境對於各國來說是存在著巨大生存威脅的狀態，這一點跟現實主義「國際社會是無政府狀態」的假定已幾乎接近。⁹最後特別值得一提的是，許多學者認為，春秋晚期各國在一連串中央集權的改革之後，在國家組織上，已經相當接近近代的主權國家（楊寬，1997：1，3，300）。¹⁰因此，如果在這個極具理想型的無政府狀態中現實主義的理論並不適用，則現實主義的理論只會更加無法適用於往後的各個朝代。

本文選擇這兩場戰役作為案例研究的第三個主要理由，與前述的前兩個理由「現實主義的關鍵案例」以及「現實主義的理想環境」有關。Copeland (2000) 的方法是屬於「關鍵案例選擇」，而「關鍵案例選擇」有兩種方法：一種是「最大可能性的案例選擇」(most-likely case study design)，選擇一個在其他的解

⁹ 雖然有一些學者認為，在東周時期各國仍然可以透過霸主來建立層級秩序以「超越無政府狀態」（陳欣之，2015），或者是認為當時的周王室仍然可以起到一些維持秩序的作用（否則為何各大國都不想去把周王室滅掉，而是放任其苟延殘喘，直到西元前256年才被秦昭襄王所滅），所以並非真正的「無政府狀態」。然而，以下三個事實仍然說明了在本文分析的兩場大戰的期間是屬於高度無政府狀態的：一、如本文在前段所述，春秋戰國時代不論是從戰爭數目、戰爭頻率，以及被滅亡的國家數目來看，都是史上極為接近現實主義「無政府狀態」假定的一段時期，否則現實主義的這個「無政府狀態」假定更難以應用到往後的各個朝代；二、在所有有關「齊吳之戰」或是「秦滅六國之戰」的史料中，從未有過大國曾經提到過要向周王室求援的記載；三、在這兩段戰事進行的期間，當時的國際體系中並沒有前述霸主或是霸主國的存在。

¹⁰ 如楊聯陞曾言：「無疑的，中國到周朝後期至少有了一些模糊的『國』的觀念。近代的一些學者曾將春秋時代（公元前772～前481年）的列國體系與近代的國際關係相比擬。戰國末期（公元前403～前221年），強國紛紛獨立，不再尊崇周王。當孟子說國君有三寶（土地、人民、政事）時，他實際上是在為『國』下定義。」（費正清編，杜繼東譯：19）。

釋變數最有可能適用的背景之下的案例，然後顯示其他的解釋變數並未帶來預期的效果，以突顯自變數的重要性；另一種是「最不可能性的案例選擇」(least-likely case study design)，選擇一個在自變數最不可能適用的背景之下的案例，然後顯示自變數確實帶來預期的效果，以突顯自變數的重要性 (George & Bennett, 2005: 120-123; Levy, 2008: 12)。根據這個標準，本文所選擇的案例為「最大可能性的案例選擇」，在東周時代，各國在各種自由主義的變數或是國內政治的變數上的變異性甚少，而且國家因戰爭而被滅亡的可能性甚大，因此在理論上應該是各種現實主義的自變數最能夠發揮效果的環境。此外，根據Gerring (2017: 41) 的分類，本文在案例分析上所使用的研究設計為「跨時案例」(longitudinal case study design)，在三種理論的自變數有變化、其他解釋變數不變的情況之下，檢查依變數的變化比較符合哪一個理論的自變數的變化。當時的主要大國政體相同（春秋晚期之前大多是由封建貴族所領導的政體，春秋晚期之後以及戰國時代逐漸轉變為中央集權的政體）、¹¹國際制度相同（當時並沒有國際組織這種協調合作的國際建制存在）、彼此貿易互賴程度極低（皆為自給自足的農業國家，貿易重要性低），而且決策者——當時各國的國君或掌權貴族——其祖先也都來自於周朝的宗室，所以選擇這個時代的案例可以說是一種受到良好控制狀態下的研究設計。換句話說，研究這兩場發生在東周時代的大戰，我們就可以排除民主和平論、制度和和平論、貿易和平論 (Copeland, 1999; Oneal & Russett, 1999; Russett & Oneal, 2001) 與國內政體 (Bueno de Mesquita & Smith, 2012) 等因素所可能帶來的影響與敵對解釋 (rival explanations)，因而保證了現實主義所著重的「無政府狀態」、「相對權力」與「極性」等等因素更可能是影響各國外交政策選擇的主因。¹²此外，當時各國的戰爭科技和武器技術基本上都非常相近，都是以「兵車」（春秋時代）或是「步兵和騎兵」（戰國時代）作為主要的攻防武力（楊寬，1997：306-311），因此也可以「排除各國是否能

¹¹ 由於當時的各國政體相同，都是由周朝的宗室所分封出來的諸侯國，擁有極為相似的政治制度，所以我們可以排除因為國內政治制度不同而導致外交政策偏好不同 (Bueno de Mesquita et al., 2003; Weeks, 2008, 2012) 的干擾，也可以排除因為政體的不同所導致國家間利益不同 (Bennett, 2006; Gartzke, 1998; Souva, 2004; Werner, 2000) 對於外交政策的干擾。

¹² 當然，這是在一個「比較的」基礎上而言。本文的意思並不是認為東周時代的國際政治狀態能夠百分之百符合現實主義的「無政府狀態」假定，而是認為東周時代跟歷史上其他所有的時期比較起來，幾乎已經是我們所能夠在歷史上找到的最能夠符合現實主義「無政府狀態」假定情境的時代。而在東周以前的傳說時代和上古時代，雖然就古籍記載仍有發生過至少百次以上的戰爭 (Cioffi-Revilla & Lai, 2001)，但當時的五帝、夏朝、商朝與西周王朝都能夠對中原地區維持一定程度的控制力，而且也都是中原地區最強大的國家，此與東周時期王室衰弱、諸侯割據的近似無政府狀態的情況有極大的差別。

夠區分對方所擁有的武器到底是進攻型的或防守型的」這個攻守平衡因素的干擾 (Glaser, 1994, 2010: 37-39; Kydd, 2005: 11-12; Rosato, 2015: 69-71)。在這種受到良好控制的情況之下，我們才能公平地去同時評估這三種現實主義外交政策理論的適用性。因此，分析春秋戰國時代的這兩場大戰，背後隱含的意義在於它是一個在良好控制之下的研究設計，讓我們可以在其他條件不變之下 (*ceteris paribus*)，探討我們所感興趣的自變數對於依變數所造成的影響。

因為以上所述的三大原因，本文認為，選擇分析「齊吳之戰」與「秦滅六國之戰」這兩場發生在東周時代的大戰，使我們能夠在一個接近理想的現實主義「無政府狀態」假定環境中，控制其他國際關係理論的敵對解釋變數，可說是一個能夠達成以研究設計來評估這三種現實主義外交政策理論的案例選擇。在本文的研究中，依變數是各國的外交政策在「擴張」和「聯盟」這兩個方面的選擇，三種不同的自變數則是來自於這三種不同的理論所分別著重的原因（促進攻勢的體系壓力原因、來自體系的壓力被國內決策者解讀的原因，以及促進守勢的體系與單元原因），敵對解釋就是其他各種非現實主義的外交政策理論的說法。在下一節中，本文將驗證在一個極為符合現實主義三大假定的歷史時空背景中，新古典現實主義的解釋最能夠符合史料所記載的外交政策選擇過程。

參、兩次重大戰爭中各國的外交決策轉變

由於秦始皇焚書的關係，目前僅存的先秦時期的史料，大致上只剩下《左傳》、《國語》、《戰國策》、《竹書紀年》、《戰國縱橫家書》、《史記》，以及各諸子百家書中所間斷提及的文本，和各種後世陸續出土的文物（楊寬，2002：1-19）。其中，又以《史記》為前述各類文本之較為完整的綜合，其餘後世的史料，如《說苑》、《新序》、《資治通鑑》等等，對於先秦時期的記載，主要也都是由前述的文本所傳抄，因此，本文對於這兩次大戰的案例研究，主要以《史記》的記載為主，其他文本的記載為輔。此外，當代學者楊寬在其《戰國史料編年輯證》(2002)一書中，對於戰國時期各國的和、戰記事與發生年代有著最為嚴謹的考訂，因此，本文所提及的各國在和、戰之間的攻守雙方與發生年代，都是以楊寬的文本作為主要依據。

一、齊吳之戰

(一) 當時的國際結構

西元前485年，齊國大夫陳恆（田常）承襲父親田乞之相位，而後唆使齊國

大夫鮑息殺掉齊悼公，立其子齊簡公為君。西元前484年，田常想要再次發動政變，但忌憚於當時齊國當政的高氏、國氏、鮑氏、晏氏等諸位卿大夫的軍事實力，因此策動他們的軍隊離開齊國去攻打魯國，使自己得以藉國內兵力空虛的機會舉事（《史記·仲尼弟子列傳》：40）。當時的國際情勢如圖一所示。跟據史料的記載，當時的齊國、吳國和晉國，皆擁有萬輛兵車實力的大國，而衰弱中的魯國以及不久之前才剛被吳國打敗且正在休養中的越國，都是擁有千輛兵車實力的小國，在權力結構上是屬於一個「多極的」國際體系。¹³

（二）史料所記載的戰爭過程

事發當時，齊國為強國，而作為小國的魯國危在旦夕。孔子聽聞自己的家



圖一 春秋末年形勢圖

資料來源：作者轉譯自許田波 (Hui, 2004: 186) 的MAP 1。

註：不顯示當時其他的數十小國。

¹³ 有關各國兵車數量的記載，可依稀見於子貢對吳王所言：「今以萬乘之齊而私千乘之魯，與吳爭疆，竊為王危之。」（《史記·仲尼弟子列傳》：42），接下來，子貢也對吳王提到齊國和晉國為與吳國同等級的大國：「越之勁不過魯，吳之疆不過齊」、「今存越示諸侯以仁，救魯伐齊，威加晉國，諸侯必相率而朝吳，霸業成矣。」（《史記·仲尼弟子列傳》：42）雖然古籍上對於兵車數量的記載非常粗略，但仍然可以看出當時大國、小國的權力分配情形。楊寬認為，在春秋過渡到戰國的這一段期間，「晉、齊、楚、越四大國對峙，成為『四分天下』的局面（墨子非攻中篇、非攻下篇、節葬下篇）」（楊寬，1997：279）。吳國在西元前506年的「柏舉之戰」大敗楚國，攻陷楚國的國都郢都，自此楚國的大國地位直到戰國中期才得以恢復。可見不論從任何可得的史料來判斷，都可以得出春秋末期的齊、晉、吳擁有大國地位的結論。

鄉即將面臨兵戎之災，於是派出子貢依序遊說齊、吳、越、晉四國，希望能夠改變魯國被齊國進攻的命運。

首先，子貢出使齊國，成功說服原本要進攻魯國的齊國轉而進攻吳國，理由是因為進攻大國（吳國）取勝的機率要比進攻小國（魯國）更小，更能增加田常以其他權臣的軍事失敗為理由來藉機篡位的合理性；接著，子貢出使吳國，成功說服原本想要進攻越國的吳王轉而進攻齊國和晉國，理由是因為鋤強扶弱能夠增加吳王稱霸的正當性；之後，子貢出使越國，成功說服原本想要躲避吳國進攻的越王轉而佯裝配合吳國進攻齊國，理由是因為越國可以趁虛而入顛覆吳國；最後，子貢出使晉國，成功說服原本只想旁觀的晉國轉而制衡吳國，理由是這是晉國稱霸的機會（《史記·仲尼弟子列傳》：40-47）。子貢接連出使各國，透過精彩的說詞，在當時的相對權力結構沒有改變之下，轉變了各國國君對於如何實現國家目標最為有利的解讀，成功地把原本的齊魯小型戰爭導引成一場捲入所有大國的大戰，其過程最為符合新古典現實主義所做的預測。最後的結果是：吳國在西元前484年與齊國大戰於艾陵（今山東省萊蕪市附近），大破齊國的軍隊，並順勢進攻晉國，結果被晉國的軍隊打敗於黃池（今河南省封丘縣附近，西元前482年），越國聽到了吳國在黃池慘敗的消息，起而襲擊吳國，¹⁴並在西元前473年完全滅掉了吳國，取而代之成為東方的霸主。《史記》總結了這一場大戰的結果為「子貢一出，存魯，亂齊，破吳，強晉而霸越。子貢一使，使勢相破，十年之中，五國各有變。」（《史記·仲尼弟子列傳》：47）。

表一整理了史料中所記載的這四國在子貢遊說前後擴張政策的轉變。從表一可以看出，大戰發生的原因最為符合新古典現實主義的假設：在各國的相對權力沒有改變的情況之下，子貢改變各國國君對局勢的解讀，使其認為系統提供了足夠的機會且自己也已經具備足夠的能力。

「齊吳之戰」這個個案研究的結果，也許仍然有一個理由無法充分突顯三

¹⁴ 在此處，《史記·仲尼弟子列傳》的記載出現了與本身的其他篇章的說法明顯不符的情形。根據《史記·晉世家》的記載，在西元前482年，吳王夫差成功地帶著大軍威壓晉國，擒晉定公於黃池，並主持了史稱「黃池之會」的諸侯會盟，順利取得霸主的地位。但根據《史記·吳太伯世家》的記載，卻是晉定公向吳王夫差威脅寧可不惜一戰也要取得霸主的地位，而因為當時越國正在攻擊吳國，所以吳王夫差在無力兩面作戰的情況之下，只好把霸主的地位讓給晉定公（《史記·吳太伯世家》：36）。不過在黃池之會之後，越王勾踐則趁著此刻吳國大軍北上、國內空虛之時，大舉入侵吳國並攻下了吳國的都城姑蘇，則是在各處史料都有相同的記載。

表一 子貢的遊說結果

出使國家 (地位/國君)	該國原本的 擴張政策	子貢遊說後 該國的擴張政策	攻勢現實主義 的預測	新古典現實主義 的預測	守勢現實主義 的預測
齊 (大國/悼公、簡公)	侵略小國魯國， 為有限度的擴 張，不涉及體系 因素	改為進攻大國吳國，但 不是出自於體系因素或 是避免最壞情況發生的 恐懼，而是因為國內政 治因素	齊國不會擴張，在 本身實力未明顯增 強之前不會進攻另 一個大國吳國，但 齊國選擇擴張	在齊國與各國的相對權力沒有 明顯的變動之下，齊國不會選 擇往大國(吳國)擴張，但子 貢的遊說改變了齊國對局勢的 解讀，進而選擇往大國(吳 國)擴張	吳國未給齊國帶來不安全感 或是安全困境，所以齊國不 會擴張，但可判定為支持對 外擴張的掌權者取得齊國外 交政策的主導權，但原本的 擴張對象是魯國
吳 (大國/夫差)	不認為有機會 向齊、晉兩大 國擴張(但事 實上晉國和齊 國的內亂已給 予機會)	改為進攻齊、晉兩大 國，但不是出自於體系 因素或是避免最壞情況 發生的恐懼，而是因為 吳王想追求霸主地位	早在二十年前本身 國力正強而且晉國 和齊國剛好發生內 亂時，就應該要同 機擴張，但一直要 等到子貢遊說之後 才選擇擴張	在吳國與各國的相對權力沒有 明顯的變動之下，吳國不會選 擇往大國(齊國)擴張，但子 貢的遊說改變了吳國對局勢的 解讀，進而選擇往大國(齊 國)擴張	齊國未給吳國帶來不安全感 或是安全困境，所以吳 國不會擴張，但吳國在掌 權者不變的情況之下，在 子貢遊說之後，外交政策 從原本向越國擴張轉為向 齊國擴張
越 (小國/勾踐)	不認為有機會 進攻大國吳國	改為認為有機會進攻大 國吳國	小國越國在未具有 足夠的實力之前不 會想去挑戰大國吳 國，但子貢遊說之 後改變了越王的戰 略	在越國與各國的相對權力沒有 明顯的變動之下，越國不會選 擇往大國(吳國)擴張，但子 貢的遊說改變了越國對局勢的 解讀，進而選擇往大國(吳 國)擴張	小國越國在未具有足夠的 實力之前不會想去挑戰大 國吳國，但子貢遊說之後 改變了越王的戰略
晉 (大國/定公)	不認為吳國是 威脅	僅採取防守，抵禦吳國 進攻，但在黃池之會中 威脅進攻吳國，但不是 出自於體系因素或是避 免最壞情況發生的恐 懼，而是因為晉國想追 求霸主地位	晉國不會擴張，在 本身實力未明顯增 強之前不會進攻另 一個大國，但晉國 威脅進攻吳國	在晉國與各國的相對權力沒有 明顯的變動之下，晉國不會選 擇往大國(吳國、齊國)擴張 (爭霸)，但子貢的遊說改變 了晉國對局勢的解讀，進而選 擇往大國(吳國、齊國)擴張 (爭霸)	吳國未給晉國帶來不安全感 或是安全困境，但晉國 在掌權者不變的情況之 下，在子貢遊說之後，外 交政策變成與吳國爭霸

資料來源：作者整理自《史記》〈十二諸侯年表〉、〈仲尼弟子列傳〉、〈吳太伯世家〉、〈魯周公世家〉、〈晉世家〉和〈越王勾踐世家〉。

種現實主義理論在解釋力上的差異性，那就是，在當時多極的國際結構之下，雖然對於魯、越等小國來說，齊、晉、吳的大國地位是非常清楚的，但是對於齊、晉、吳這三個大國來說，彼此之間因為相對實力差不多，因此彼此之間所帶給對方的安全壓力可能並不是十分明確。本文的第二個案例「秦滅六國之戰」即在證明，即使是在國際系統存在著一個相當清楚的權力威脅之下，各國的「結盟政策」仍然必須取決於決策者對於當前局勢的解讀，國際體系的相對權力分布仍然必須透過一個「新古典現實主義」的管道才能轉換成國家的外交政策。

二、秦滅六國之戰

(一) 國際結構的演變：從戰國中期的「多極體系」到戰國晚期的「兩極體系」

在秦滅六國之戰正式逐步開始之前，當時的局勢為數十個小國與七個大國（秦、楚、韓、魏、趙、燕、齊）併存的局面。戰國初期的秦國其實僅為中等實力的國家，與魏國的多次戰爭敗多勝少，但在西元前356年（距離秦統一天下135年之前）秦孝公任用商鞅變法、獎勵耕戰之後，秦國開始崛起，因此在權力結構上，從西元前356年之後約半個世紀左右的時間，大約在秦孝公、秦惠文王和秦昭襄王初年的期間，當時的國際結構可以說是一個標準的「多極體系」。

由於秦國在崛起後不斷地東出擴張成功，在西元前288年（距離秦國統一天下68年之前）的秦昭襄王中期左右，中間五國陸續失去其大國的地位。當時秦國「遠交近攻」的策略運作成功，秦昭襄王誘同齊湣王彼此承認對方的帝號，秦為西帝、齊為東帝，國際體系正式成為西方的秦國與東方的齊國兩強並存的「兩極體系」(Hui, 2005: 65-66)。四年之後（西元前284年），齊國被五國聯軍攻破，僅剩即墨和莒兩城，雖然在西元前279年田單成功反攻收復齊國，但齊國再也不復強國地位。此時，趙國在西元前307年趙武靈王變法之後開始興起，遂取代齊國成為戰國時期最後一個能夠和秦國抗衡的大國，¹⁵從西元前269年秦國在「闕與之戰」敗給趙國，一直到西元前260年秦趙「長平之戰」秦國獲得慘勝，再到西元前257年秦國被趙國接連打敗的這段期間，國際體系為秦趙「兩極體系」。¹⁶

¹⁵ 在西元前269年的「闕與之戰」中，趙軍大敗秦軍，是秦國東出數十年以來少見的大敗。

¹⁶ 根據靳生禾、謝鴻喜(1998)的研究，在長平之戰中，趙國動用了傾國五十萬人左右的軍

(二) 史料所記載的聯盟過程

除了秦國本身一連串富國強兵的改革之外，秦滅六國之戰的一大關鍵，在於六國「合縱」政策的失敗以及秦國「連橫」政策的成功 (Hui, 2004, 2005, 2007)。當時秦國雖強，但要兼併六國仍然力猶未逮，這一點可在史籍之中有關秦國國君與說客的對話中看出，¹⁷亦可從秦國曾三次被多國聯軍打敗過的記載中得到證實。¹⁸雖然當時秦國在商鞅變法後國力日強，但在戰國時期大多數的時間裡，六國之中任兩國的實力加總依然是勝於秦國，理應無法讓秦國達成統一天下的目的。然而，六國合縱政策的失敗與秦國連橫策略的成功，使秦國得以在一次只與一個國家作戰的情況之下，順利將六國各個擊破。因此，秦滅六國之戰的關鍵可說是取決於六國外交政策的轉變，也就是六國從「各自為戰」到「合縱」（抗衡秦國）再轉向「連橫」（扈從秦國）的整個決策過程。而這個影響六國外交政策選擇的過程，再一次，是新古典現實主義的解釋最為符合史料上的記載。

1. 戰國中期的多極體系：蘇秦促成合縱、張儀策動連橫

抗秦的合縱策略之所以能夠在六國中建立起來的原因，在於蘇秦的成功倡導。事實上，根據《史記》的記載，蘇秦一開始是先到秦國遊說秦惠文王積極採行統一天下的作為，然而蘇秦在秦國並未受到重用，因此以「聞達於諸侯」為志的他只好投奔其他六國，並轉為鼓吹各國聯合抗秦。

蘇秦首先到燕國，對燕王分析了為何秦國無法進攻燕國的原因，在於趙國的阻隔，而趙國為何可以輕易進犯燕國的原因，在於地理的臨近（《史記·蘇

隊，而秦國在戰爭後期秦昭襄王親自趕到河內郡命令郡內十五歲以上男丁悉數出征支援長平前線之前，也已動用了傾國六十萬人左右的軍隊，而在同時期的其他五國竟然完全沒有出兵救援秦、趙或是騷擾兩國後方，這在相互兼併風氣甚烈的戰國時期可謂異常，可見當時其他五國已經明顯失去了作為大國的實力。

¹⁷ 例如蘇秦在勸說秦惠文王採行其道以統一天下的時候，秦惠文王回答說：「毛羽未成，不可以高蜚；文理未明，不可以并兼。」（《史記·蘇秦列傳》：3）因此並未重用蘇秦，而這也是蘇秦之所以改為轉往他國求仕並且也改為倡導合縱而非連橫的原因。從這個記載可以看出，當時秦惠文王自己並不認為秦國已經具有可以統一天下的實力。

¹⁸ 根據許田波 (Hui, 2005) 的統計，秦國這三次被多國聯軍打敗的戰役為：一、西元前 298 ~ 前 296 年，齊國聯合韓、魏攻函谷關，秦被迫割讓河東之地求和；二、西元前 259 ~ 前 257 年，楚、魏聯軍幫助趙國解除秦國對其都城邯鄲的圍困；三、西元前 247 年，趙、韓、楚、燕幫助魏國解除秦國對其都城大梁的圍困。值得注意的是，聯軍第三次打敗秦國的時候，山東各國其實都已經失去大國的地位，秦國已占有整個系統一半以上的領土，即使如此，各國若能夠成功聯合起來，在軍事能力上還是能夠與秦國抗衡。

秦列傳》：6)。這一番話讓原本沒有感受到趙國威脅的燕王認知到了趙國的危險性，因此同意出資讓蘇秦帶著大批人馬和金銀前往趙國請求結盟。蘇秦對趙王分析，倘若趙國只跟其他五國中之一、兩個國家修好，都將留給秦國各種執行對趙國不利的外交政策的空間，唯有趙國與其他五國結盟，立下盟約，方能使秦國不論進攻哪一個國家都會腹背受敵，因此六國的安全才得以保全（《史記·蘇秦列傳》：10-16）。原本只想採取「遠交近攻」策略的趙王，在聽完蘇秦的分析之後，深深感到國家安全受到嚴重的威脅，於是在趙王的大力支援下，蘇秦開始奔走各國，試圖游說各國組成一個抗秦的聯盟。

接著，蘇秦來到韓國，當時韓王所採取的策略為「西面侍秦，交臂而服」（《史記·蘇秦列傳》：19）。為了改變韓王扈從秦國的態度，蘇秦告訴韓王，以韓國精良的武器和勇敢的將士，完全大可與秦國抗衡，然而韓國對秦國卻選擇了使天下人恥笑的順從態度。如果韓國順從的方針不改，則秦國遲早會要求韓國不斷割讓城池給秦國，如此一下，秦國將愈來愈強，韓國將愈來愈弱，遲早無以為繼（《史記·蘇秦列傳》：19-20）。聽完蘇秦的說詞，韓王答應加入抗秦的聯盟。

然後，蘇秦來到魏國，對魏王分析道，魏國事實上擁有易守難攻的天險、富饒的物產與經濟，以及充足的軍事能力，如果不改變目前扈從秦國、掠奪其他五國的外交政策，則其他五國將愈弱，秦國將愈強，最後受害的仍為魏國本身；反之，若魏國能夠聯合其他五國一起對抗秦國，則再也不用擔心強秦的威脅（《史記·蘇秦列傳》：22-24）。聽完了蘇秦的分析，魏王也答應加入盟約。

取得了燕、趙、韓、魏四國的共識之後，蘇秦來到東方的齊國。齊國與秦國並不接壤，距離秦國也最為遙遠，加上秦國一向採取「遠交近攻」的策略，因此齊國在甚少直接感受到秦軍威脅的情況之下，長期以來一直都是採取侍奉秦國的策略。為了取得齊王的加盟，蘇秦對齊王分析道，齊國不像韓國和魏國必須直接面對秦國的軍隊，而是擁有四面都有天險的優良地理位置、強壯的軍力、充足的糧食與富庶的社會，完全具備與秦國抗衡的實力；更何況，秦國根本不可能輕易越過魏國和趙國來攻打齊國，因此安全無虞的齊國採取侍奉秦國的外交政策是相當錯誤且可恥的策略（《史記·蘇秦列傳》：26-28）。聽完了蘇秦的分析，齊王也決定投入抗秦的行列。

最後，蘇秦向西南來到了楚國，對楚王分析楚國的優勢所在，強調楚國所擁有的天險與軍事實力，說明每一次只要楚國與韓國、魏國為戰，則秦軍都能趁勢進犯楚國，而楚國如果與韓國、魏國合作抗秦，則秦國在韓、魏、楚的三

方夾擊之下，只能伏首稱臣（《史記·蘇秦列傳》：30-35）。聽完了蘇秦的分析，一向與秦國和親而疏遠其他五國的楚國也同意加入了盟約。

至此，在蘇秦的奔走下，成功使六國締結了合縱抗秦的盟約。而為了突破六國的聯盟，秦惠文王任用張儀，開始策劃破解合縱、攻打六國的計畫。

張儀瓦解合縱聯盟的腳步首先從魏國開始。張儀對魏王分析，魏國的土地狹小，軍隊人數不足，地勢平坦，又處於四戰之地，非常容易遭到各國的入侵。更何況，各國締結合縱盟約的真實目的，也只是在增強自己、消耗他國，只要局勢一有利，各國馬上就會背棄盟約來攻打對方，這種盟約完全不可靠。如果魏王願意侍奉秦國，則強大的秦國將會保護魏國不受四鄰的攻打（《史記·張儀列傳》：13-17）。聽完了張儀的分析，魏王隨即背棄了合縱的盟約，而加入了秦國的連橫。雖然先前的蘇秦成功地讓魏王瞭解到，以魏國充足的地利與軍力，如果聯合其他五國，絕對有能力可以跟秦國一較長短，然而，張儀將天下的局勢對魏王重新分析了一番之後，在客觀的各國相對權力並未明顯改變的情況之下，魏王對相對權力的解讀與認知有所轉變，而使其外交政策從「與其他五國合縱抗衡秦國」轉變成為「與秦國連橫掠奪其他五國」。

後來，秦國想要攻打齊國，但卻忌憚齊國與楚國締有合縱的盟約，於是再度派出張儀前往說服楚國與秦國連橫。張儀對楚王分析，秦國的軍隊能夠毫不費力地就直搗楚國的中心（《史記·張儀列傳》：27，29-30），而且楚國在經歷多年的對吳國作戰之後國力空虛（《史記·張儀列傳》：28），再加上蘇秦即使成功合縱了各國，各國卻仍然常常背信棄義，還趁機幫助燕國攻破齊國（《史記·張儀列傳》：31）。楚王聽完張儀的分析，改變其對於局勢的解讀，也轉為加入秦國的連橫。

接著，張儀轉往韓國，對韓王分析韓國的土地多麼地貧瘠、狹小，士兵的人數與戰鬥能力和強大的秦國相比有多麼地不足，如今秦國想要的只是削弱楚國，而不是要奪取韓國，所以如果韓王願意配合秦國對楚國的戰事，則秦國在攻取楚國之後將會給予韓國豐厚的土地回報，這個比參加螳臂擋車、無利可圖的合縱聯盟更有利得多（《史記·張儀列傳》：34-37）。聽完了張儀的分析，韓王也背棄了合縱的盟約，加入了秦國的連橫。

沒多久之後，秦國想要攻打北方的趙國，但又忌憚齊國出兵幫助趙國，於是秦王派出張儀出使齊國，對齊王分析道，為什麼過去魯國對齊國接連打了三次勝仗，但魯國卻滅亡了？這是因為齊國大而魯國小的緣故。為什麼過去秦國接連四次被趙國給打敗，吞下四次慘烈的敗仗，但殘破不堪的卻是趙國，而依

然強盛的卻是秦國？這是因為秦國大而趙國小的緣故。如果齊王不配合秦國，那秦國就會唆使韓國、魏國攻打齊國的南方，唆使趙國攻打齊國的北方，到時候後悔就太晚了（《史記·張儀列傳》：38-39）。在張儀的分析之下，齊國的安全在一夕之間似乎就變得岌岌可危，這與蘇秦認為齊國的地位安全無虞的說詞大不相同，齊王聽了張儀的說詞以後，轉為配合秦國的連橫。

連橫了魏、楚、韓、齊四國之後，秦王派張儀遊說趙國，希望能夠讓趙國自願獻出土地。張儀對趙王說，趙國最堅強的四個合縱盟友都已經臣服了秦國，而且還願意幫助秦國來攻打趙國、瓜分趙國的土地，所以趙王現在你有兩個選擇，一個是冒著國家滅亡的危險與五國作戰，另一個是割讓土地給秦國請秦國不要進軍趙國（《史記·張儀列傳》：43-45）。在張儀的遊說之下，身為合縱聯盟發起者的趙國選擇了割讓土地，剩下的燕國眼見各國紛紛接受與秦的連橫，合縱聯盟的大勢已去，也對秦國獻出城池以避免戰爭（《史記·張儀列傳》：47-49）。至此，在張儀的遊說之下，六國一一改變其聯盟抗秦的策略，轉為與秦國連橫，由蘇秦所串聯起來的合縱聯盟正式瓦解（《史記·張儀列傳》：47-49）。

由於蘇秦和張儀的精采說詞，六國在各國的相對權力和極性沒有顯著改變的情況之下，在短期之內紛紛改變了對局勢的解讀，以致於出現了截然相反的聯盟政策。表二整理了六國在蘇秦和張儀的遊說前後結盟政策的轉變。

從表二的整理可見，面對秦國的威脅，六國能夠成功聯合起來制衡秦國的關鍵，並非如守勢現實主義所說，在面對一個共同的嚴重威脅時六國能夠主動建立起一個權力平衡秦國的聯盟，而是必須要透過蘇秦的遊說，在一個各國相對權力事實上並沒有發生立即改變的情況之下，改變了六國國君對相對權力的認知；也並非如攻勢現實主義所說，在多極體系之下國家之間因為有強烈的卸責誘因而使得一個權力平衡的聯盟難以形成，而是很明顯地，在蘇秦的運作之下，六國成功地完成合縱的串連，使秦國對外擴張的意圖受到了阻礙。¹⁹在這整個過程中，國家之間的相對權力（極性）所帶來的威脅感，是透過一個新古典現實主義的途徑由蘇秦傳達給各國的國君，才將「相對權力帶給各國的生存壓力」與「國家之間的聯盟策略」的因果關係給聯結了起來。²⁰

¹⁹ 這裡有必要加以說明的是，根據史家最新的考證，張儀的「連橫」要破解的目標應該是在西元前 323 年由公孫衍（犀首）所串聯起來的「合縱」，而非西元前 287 年由張儀所串聯起來的「合縱」，《史記》把公孫衍誤植為張儀（楊寬，1997：22）。但從國際關係理論的觀點來說，無論「合縱」或是「連橫」的倡導者為何人、發生的時間先後為何，六國的聯盟政策較為符合新古典現實主義的預測仍為事實。

²⁰ 這邊可以很快地排除兩個關於「缺乏制衡」的敵對解釋：第一，秦國很明顯地並不是一

表二 蘇秦和張儀的遊說結果

出使國家 (國君)	該國原本的 結盟政策	蘇秦遊說之後該國 的結盟政策	張儀遊說之後該國 的結盟政策	攻勢現實主義的預測	守勢現實主義的預測
燕 (文公、昭王)	孤立、對抗趙國	與五國結盟抗秦	與秦國結盟，扈從秦國	不與秦接壤，推卸制衡秦國的責任，但不會扈從秦國	秦國是明顯的威脅，各國應自強改革(內部制衡)或是與他國結盟抗秦(外部制衡)
趙 (肅侯、武靈王)	遠交近攻	與五國結盟抗秦	與秦國結盟，扈從秦國	與秦接壤，較難推卸制衡秦國的責任，但不會扈從秦國	秦國是明顯的威脅，各國應自強改革(內部制衡)或是與他國結盟抗秦(外部制衡)
韓 (宣惠王)	扈從秦國	與五國結盟抗秦	與秦國結盟，扈從秦國	與秦接壤，較難推卸制衡秦國的責任，但不會扈從秦國	秦國是明顯的威脅，各國應自強改革(內部制衡)或是與他國結盟抗秦(外部制衡)
魏 (惠王、襄王、哀王)	扈從秦國	與五國結盟抗秦	與秦國結盟，扈從秦國	與秦接壤，較難推卸制衡秦國的責任，但不會扈從秦國	秦國是明顯的威脅，各國應自強改革(內部制衡)或是與他國結盟抗秦(外部制衡)
齊 (宣王、湣王)	孤立、扈從秦國	與五國結盟抗秦	與秦國結盟，扈從秦國	不與秦接壤，推卸制衡秦國的責任，但不會扈從秦國	秦國是明顯的威脅，各國應自強改革(內部制衡)或是與他國結盟抗秦(外部制衡)
楚 (懷王)	扈從秦國	與五國結盟抗秦	與秦國結盟，扈從秦國	與秦接壤，較難推卸制衡秦國的責任，但不會扈從秦國	秦國是明顯的威脅，各國應自強改革(內部制衡)或是與他國結盟抗秦(外部制衡)

資料來源：作者整理自《史記》〈六國年表〉、〈蘇秦列傳〉、〈張儀列傳〉、〈燕召公世家〉、〈楚世家〉、〈趙世家〉、〈魏世家〉、〈韓世家〉。

而張儀連橫策略的成功，以現代國際關係的概念來講，就是成功地使各國選擇了「扈從」秦國的政策。那麼，國家何時選擇扈從呢？如前所述，攻勢現實主義和守勢現實主義無法解釋國家為何在面對威脅的時候要選擇扈從，因為扈從的選擇與這兩個理論的內在邏輯並不相容。攻勢現實主義認為，選擇扈從只會讓自己失去安全、自取滅亡，此與大國想要盡可能擴大自己的相對權力和盡可能縮小對手的相對權力的推論並不相符；守勢現實主義認為，大國總是加入較弱的一方，不會去扈從強者，因為獲得權力只是獲得安全的手段，獲得安全才是國家的最高目標。在這三大現實主義外交政策理論中，唯有新古典現實主義才有辦法提供了國家為何選擇扈從的說法：國家試圖在結構施加的限制與本身能力的限制這兩個考量之下，盡可能極大化其對外部環境的影響力，因此當決策者對於相對權力的解讀認為是採取扈從或抗衡是當下最有利的選擇的時候，國家就會採取扈從或抗衡的行為。²¹

當時，六國各自的國力雖然不如秦國，但秦國在整個統一的過程之中，都一直在努力避免在攻打任何一個國家的時候遇到他國趕來救援而必須兩面作戰的情形，可見以當時的局勢來說，任何兩國以上軍隊力量的加總，都是能夠與秦國一較長短的；而且，一直到西元前221年統一天下的不久之前，秦國在西元前247年對魏國的戰爭、西元前236 ~ 前228年對趙國的戰爭，以及西元前226 ~ 前223年對楚國的戰爭，都曾經遭遇慘烈的敗仗 (Hui, 2005: 72, 242-248)。這些史實說明了，當時秦國實際所擁有的相對權力，其實並不如各國的國君所感受到的那樣強大。然而，這個客觀的相對權力分布（極性），在經過不同的說客以不同的包裝方式傳達給各國的國君之後，相同的權力分布在決策者不同的認知與解讀之下產生了不同的外交政策選擇，這個過程與新古典現實主義的預測最為相符。²²

個仁慈的霸權所以各國不需要去制衡它 (Ikenberry, 2000, 2002, 2011; Kupchan, 1998)；第二，從六國後續的行為來看，六國很明顯地也不是因為想要「購買時間」以等待未來本身實力增強以後再來採取抗衡秦國的「內部制衡」(Ripsman & Levy, 2008)，這是因為在後續的歷史演變中，六國仍然陸續出現了與秦國結盟（連橫）幫助秦國併吞他國的行為，這個邏輯只會讓各國永遠都等不到本身實力與秦國一樣強的那一天。

²¹ 山東六國不僅欠缺外部制衡（結盟抗衡）秦國的行為，而且除了趙國之外，其他國家連內部制衡（改革圖強）的作為都不明顯，各國僅有的幾次變法都以失敗告終，這個現象與攻勢和守勢現實主義的預測都相反，而與新古典現實主義對於國家內部動員能力的預測較為相符。

²² 根據《史記》的記載，在張儀的連橫政策奏效之後，各國在之後的數十年間的外交政策都曾經在「合縱」或「連橫」的選擇中來來回回過數次，端視當時各國國君對情勢的解

2. 戰國晚期的兩極體系：秦齊、秦趙兩極體系下的各國聯盟策略

在秦國的蠶食鯨吞之下，各國陸續失去其大國地位，在戰國的晚期出現了兩次兩極體系：西元前288～前284年的秦齊兩極體系，以及西元前270～前257年的秦趙兩極體系。攻勢和守勢現實主義都預測，在兩極體系之下，因為已經沒有其他大國可以對抗秦國，所以齊國與趙國兩個僅存的大國將無法迴避，必須承擔起領導各國制衡秦國的責任，而且守勢現實主義還預測，這個制衡秦國的聯盟，將會是一個非常穩定、不易改變的均衡，且齊國和趙國也將會積極改革圖強，發展內部制衡。然而，實際的情況又是如何呢？

在秦齊兩極體系之時，根據史料的記載，齊國不僅沒有承擔起抗秦的責任，還不斷攻打中間的宋（西元前286年）、楚（西元前286年）、魏（西元前286年）三國，也因此引發了燕國聯合其他四國聯軍聯手滅齊的事件（西元前284年）。在這段期間中，齊國只有在遭遇秦國攻打的時候（西元前285年）才有對抗秦國的舉動，從未展現積極制衡秦國的意圖，也沒有積極從事內部制衡的圖強作為。

在秦趙兩極體系之時，根據史料的記載，趙國不僅沒有承擔起抗秦的責任，還在秦國攻打魏國（西元前286～前266年）和韓國（西元前265～前261年）時束手旁觀，並與齊國聯合攻打燕國（西元前265年）。同樣地，在這段期間中，趙國只有在遭遇秦國攻打的時候（西元前265年）才有對抗秦國的舉動，從未展現積極制衡秦國的意圖，也沒有積極從事內部制衡的圖強作為。

也就是說，在兩極體系之下，齊、趙兩大國不僅從未承擔起抗秦的責任或是積極從事內部制衡的作為，反而還多次攻打中間的國家；而中間的國家不僅未能與齊、趙兩大國結盟制衡秦國的威脅，或是積極尋求兩大國的協助，反而是繼續受到秦國的威脅利誘而相互爭戰。這些現象都與攻勢現實主義與守勢現實主義的預測大相逕庭，而必須得透過新古典現實主義的解釋才能夠理解：一來，秦國擁有極不對等的相對權力的這個客觀事實，並不能讓各國直接感受到「自己受到安全的威脅所以必須要抗衡」，此與完全從系統變數來預測國家

讀而定。正如許田波所言，在這段期間，「六國不僅相互攻擊，而且在這個相互攻擊的過程中紛紛尋求秦國的幫助。六國全部都在合縱和連橫之間搖擺不定。在這種情形下，連橫其實可以被理解為兩種意義：它除了是秦國對六國各個擊破的策略之外，也可以被理解為六國為了彌補對秦國作戰所造成的損失而相互攻擊以獲取領土的行為。」(Hui, 2005: 76) 這個事實與攻勢／守勢現實主義所預測的擴張理由更加不相符，而與新古典現實主義所預測的擴張理由「根據自己擁有的實力多寡來盡力控制和形塑外部的環境，以提高自身的外部影響力」最為相符。

生存威脅的攻勢現實主義的推論不符，也與認為六國應該要去制衡崛起的強國或是威脅的守勢現實主義相左；二來，在這段期間，秦國不斷地向各國威脅利誘，說服他們配合秦國的連橫，也不斷地向各國的官員行賄，讓他們說服各國國君轉移對秦國的反抗，持續讓各國的國君對於系統所給予的壓力有錯誤的認知與解讀，正是一個典型的新古典現實主義所想要解答的「制衡不足」(underbalancing) 的問題 (Schweller, 2004, 2006)。在成功的連橫策略運用之下，秦國在西元前229年滅韓、西元前228年滅趙、西元前225年滅魏、西元前223年滅楚、西元前222年滅燕，最後在西元前221年滅齊，統一天下。

肆、結論

雖然各種國際關係主流學派對於中國的崛起有著樂觀或是悲觀的不同看法 (Friedberg, 2005)，不過，隨著中國的實力愈來愈接近美國，在這些主流理論中，以「權力」為中心的理論，幾乎都對中美局勢的發展和東亞的區域安全有著較為悲觀的預測。例如，古典現實主義 (classical realism) 認為，當中國的實力超越美國在東亞主持的均勢時，將是中美大規模衝突的開端；霸權穩定論 (hegemonic stability theory) 認為，當美國失去東亞區域霸權的地位、無力維持區域的和平時，則中國將會對東亞的區域安全造成威脅；權力轉移理論 (power transition theory) 認為，當美國的實力衰退，而不滿於現狀的中國崛起，在權力消長的交叉點附近中國將會挑戰美國霸主的地位；而權力動態差異理論 (dynamic differentials theory) 則認為，當美國察覺到衰退無法避免，而中國的實力在未來將會超越美國時，則美國很可能會在優勢喪失之前對中國發起預防性的戰爭 (preventive war)。²³

這些不同的理論，在本質上最主要想要解釋的是大國之間的戰爭行為，而中國崛起至今，尚未與任何大國發生大規模的戰爭，在無法直接驗證哪一種理論的解釋最為接近現實的情況之下，本文試圖從歷史的研究汲取養分，探討當代國際關係理論對於中國古代歷史的理解所能夠賦與當代中國行為的可能意義。誠如學者吳玉山所言，如果要使歷史的研究和討論對於現代的現象產生意

²³ 關於這些現實主義理論的詳細比較，可參見 Copeland (2000) 書中的第一章。這邊要特別說明的是，Copeland 將這些理論都稱為「現實主義」的理論，不無疑問，因為各種現實主義所假定的國際體系是「無政府狀態」(anarchy)，而霸權穩定論和權力轉移理論所假定的國際體系是「階層狀態」(hierarchy)，兩者之間有重大的不同，比較準確的說法應該是「這些以權力為中心的理論普遍對於中國的崛起有著悲觀的看法」。作者感謝本文的其中一位匿名審查人協助指出這個重大的區別。

義，最重要的就是理解事件發生的因果機制，透過對於因果機制的確認，來使中國古代的對外行為與當代中國的對外行為連接起來（吳玉山，2018：15-16）。本文分析發生在東周末年的兩場大國戰爭中各個大國的「擴張理由」和「聯盟行為」，並且發現，在當時非常接近現實主義無政府狀態的歷史背景中，根據史料的記載，影響各國行為的因果機制在這三大理論中最为接近「新古典現實主義」的論述。這個發現對於當代的意義可說是憂喜參半：樂觀的是，中美之間的權力變化並不必然如攻勢現實主義所說的那樣將會直接導致大規模的衝突，中間還需要各種新古典現實主義的過程變數才能決定最後的影響；而悲觀的是，不論是在何種相對權力的分布之下，大國之間不論是擴張也好或是結盟也好，仍然出現了各種現實主義所預測將會出現的競爭與衝突行為。當然，歷史的研究總是充滿了各種不同的觀點，亦有可能是受限於東周時期史料不足的限制，因此新古典現實主義的解釋力在現存的史料中較被突顯，未來相關的歷史研究，特別是在宋朝之後的對外關係史，因史料相對更為充足，相信應可提供研究者更為豐富的記載，讓研究者更有辦法持續探究更為細緻的前提條件與因果機制，讓國際關係理論與歷史的對話持續提供我們更多的當代意義。

參考文獻

一、中文部分

- Sturgeon, D.編，2011，〈中國哲學書電子化計劃〉，中國哲學書電子化計劃：
<http://ctext.org>。2016/10/1。
- 吳玉山，2018，〈歷史與國關〉，載於吳玉山（編），《中國再起：歷史與國關的對話》，頁3-22，臺北：國立臺灣大學人文社會高等研究院東亞儒學研究中心。
- 唐世平著，董杰旻、朱鳴譯，2017，《國際政治的社會演化：從西元前8000年到未來》，北京：中信。
- 唐欣偉，2018，〈攻勢現實主義能否解釋古代東亞區域政治？以秦始皇到漢武帝間與匈奴之和戰為例〉，載於吳玉山（編），《中國再起：歷史與國關的對話》，頁111-132，臺北：國立臺灣大學人文社會高等研究院東亞儒學研究中心。
- 唐欣偉、唐豪駿，2017，〈以西漢前期對胡越之行動檢視攻勢現實主義〉，《政治學報》，第64期，頁23-39。doi:10.6229/CPSR.2017.64.02
- 陳欣之，2015，〈超越無政府狀態：先秦秩序取向政治思潮對國際關係典範的啟示〉，《政治科學論叢》，第63期，頁129-164。
- 張登及、陳瑩羲，2012，〈朝貢體系再現與「天下體系」的興起？中國外交的案例研究與理論反思〉，《中國大陸研究》，第55卷第4期，頁89-123。doi:10.30389/MCS.201212_55(4).0004
- 費正清編，杜繼東譯，2010，《中國的世界秩序：傳統中國的對外關係》，北京：中國社會科學。
- 靳生禾、謝鴻喜，1998，《長平之戰：中國古代最大戰役之研究》，太原：山西人民。
- 楊仕樂，2017，〈儒家文化、軟權力與霸權抉擇：清初的案例研究（1676～1735）〉，《政治學報》，第64期，頁75-103。doi:10.6229/CPSR.2017.64.04
- 楊寬，1997，《戰國史》，臺北：臺灣商務。
- 楊寬，2002，《戰國史料編年輯證》，臺北：臺灣商務。

二、英文部分

- Bennett, D. S., 2006. "Toward a Continuous Specification of the Democracy-Autocracy Connection." *International Studies Quarterly*, Vol. 50, No. 2, pp. 313-338.

- doi:10.1111/j.1468-2478.2006.00404.x
- Bueno de Mesquita, B., & Smith, A., 2012. "Domestic Explanations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Annual Review of Political Science*, Vol. 15, No. 1, pp. 161-181. doi:10.1146/annurev-polisci-070209-174835
- Bueno de Mesquita, B., et al., 2003. *The Logic of Political Survival*. Cambridge, MA: MIT Press.
- Christensen, T. J., 1997. "Perceptions and Alliances in Europe, 1865–1940."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Vol. 51, No. 1, pp. 65-97. doi:10.1162/002081897550302
- Christensen, T. J., & Snyder, J., 1990. "Chain Gangs and Passed Bucks: Predicting Alliance Patterns in Multipolarity."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Vol. 44, No. 2, pp. 137-168. doi:10.1017/S0020818300035232
- Cioffi-Revilla, C., & Lai, D., 2001. "Chinese Warfare and Politics in the Ancient East Asian International System, CA. 2700 B.C. to 722 B.C." *International Interactions*, Vol. 26, No. 4, pp. 347-378. doi:10.1080/03050620108434971
- Copeland, D. C., 1999. "Trade Expectations and the Outbreak of Peace: Détente 1970–74 and the End of the Cold War 1985–91." *Security Studies*, Vol. 9, No. 1-2, pp. 15-58. doi:10.1080/09636419908429394
- Copeland, D. C., 2000. *The Origins of Major War*. Ithaca, NY: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 Friedberg, A. L., 2005. "The Future of U.S.–China Relations: Is Conflict Inevitable?"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 30, No. 2, pp. 7-45. doi:10.1162/016228805775124589
- Gartzke, E., 1998. "Kant We All Just Get Along? Opportunity, Willingness, and the Origins of the Democratic Peace." *American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 Vol. 42, No. 1, pp. 1-27. doi:10.2307/2991745
- George, A. L., & Bennett, A., 2005. *Case Studies and Theory Development in the Social Sciences*. Cambridge, MA: MIT Press.
- Gerring, J., 2017. *Case Study Research: Principles and Practices* (2nd ed.)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Glaser, C. L., 1994. "Realists as Optimists: Cooperation as Self-Help."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 19, No. 3, pp. 50-90. doi:10.2307/2539079
- Glaser, C. L., 1997. "The Security Dilemma Revisited." *World Politics*, Vol. 50, No. 1, pp. 171-201. doi:10.1017/S0043887100014763
- Glaser, C. L., 2010. *Rational Theory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The Logic of Competi-*

- tion and Cooperation*.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 He, K., 2017. "Explaining United States–China relations: Neoclassical Realism and the Nexus of Threat–Interest Perceptions." *The Pacific Review*, Vol. 30, No. 2, pp. 133-151. doi:10.1080/09512748.2016.1201130
- Herz, J. H., 1950. "Idealist Internationalism and the Security Dilemma." *World Politics*, Vol. 2, No. 2, pp. 157-180. doi:10.2307/2009187
- Holsti, K. J., 1995. *International Politics: A Framework for Analysis* (7th ed.). Englewood Cliffs, NJ: Prentice Hall.
- Holsti, K. J., 1999. "The Coming Chaos? Armed Conflict in the World's Periphery." In T. V. Paul & J. A. Hall, eds., *International Order and the Future of World Politics* (pp. 283-310).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Hui, V. T.-B., 2004. "Toward a Dynamic Theory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Insights from Comparing Ancient China and Early Modern Europe."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Vol. 58, No. 1, pp. 175-205. doi:10.1017/S0020818304581067
- Hui, V. T.-B., 2005. *War and State Formation in Ancient China and Early Modern Europe*.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Hui, V. T.-B., 2007. "The Triumph of Domination in the Ancient Chinese System." In S. J. Kaufman, R. Little, & W. C. Wohlforth, eds., *The Balance of Power in World History* (pp. 122-147). New York: Palgrave Macmillan.
- Ikenberry, G. J., 2000. *After Victory: Institutions, Strategic Restraint, and the Rebuilding of Order after Major Wars*.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 Ikenberry, G. J., 2002. *America Unrivaled: The Future of the Balance of Power*. Ithaca, NY: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 Ikenberry, G. J., 2011. *Liberal Leviathan: The Origins, Crisis, and Transformation of the American World Order*.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 Jervis, R., 1978. "Cooperation under the Security Dilemma." *World Politics*, Vol. 30, No. 2, pp. 167-214. doi:10.2307/2009958
- Jung, S. C., & Lee, K., 2017. "The Offensive Realists are not Wrong: China's Growth and Aggression, 1976–2001." *Pacific Focus*, Vol. 32, No. 1, pp. 86-108. doi:10.1111/pafo.12088
- Kupchan, C. A., 1998. "After Pax Americana: Benign Power, Regional Integration, and the Sources of a Stable Multipolarity."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 23, No. 2, pp. 40-79. doi:10.2307/2539379

- Kydd, A. H., 2005. *Trust and Mistrust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 Labs, E. J., 1997. "Beyond Victory: Offensive Realism and the Expansion of War Aims." *Security Studies*, Vol. 6, No. 4, pp. 1-49. doi:10.1080/09636419708429321
- Levy, J. S., 2008. "Case Studies: Types, Designs, and Logics of Inference." *Conflict Management and Peace Science*, Vol. 25, No. 1, pp. 1-18. doi: 10.1080/07388940701860318
- Lewis, M. E., 1990. *Sanctioned Violence in Early China*. Albany, NY: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
- Liff, A. P., & Ikenberry, G. J., 2014. "Racing toward Tragedy? China's Rise, Military Competition in the Asia Pacific, and the Security Dilemma."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 39, No. 2, pp. 52-91. doi:10.1162/ISEC_a_00176
- Lobell, S. E., Ripsman, N. M., & Taliaferro, J. W., 2009. *Neoclassical Realism, the State, and Foreign Policy*.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Lynn-Jones, S. M., 1998. "Realism and America's Rise: A Review Essay."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 23, No. 2, pp. 157-182. doi:10.2307/2539382
- Mearsheimer, J. J., 2001. *The Tragedy of Great Power Politics*. New York: W. W. Norton & Company.
- Mearsheimer, J. J., 2014. *The Tragedy of Great Power Politics* (Updated ed.). New York: W. W. Norton & Company.
- Narizny, K., 2017. "On Systemic Paradigms and Domestic Politics: A Critique of the Newest Realism."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 42, No. 2, pp. 155-190. doi:10.1162/ISEC_a_00296
- Oneal, J. R., & Russett, B., 1999. "The Kantian Peace: The Pacific Benefits of Democracy, Interdependence, and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s, 1885-1992." *World Politics*, Vol. 52, No. 1, pp. 1-37. doi:10.1017/S0043887100020013
- Parent, J. M., & Rosato, S., 2015. "Balancing in Neorealism."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 40, No. 2, pp. 51-86. doi:10.1162/ISEC_a_00216
- Raditio, K. H., 2015. "China's Shifting Behaviour in the South China Sea: A Defensive Realist Perspective." *American Journal of Chinese Studies*, Vol. 22, No. 2, pp. 309-328.
- Ripsman, N. M., & Levy, J. S., 2008. "Wishful Thinking or Buying Time? The Logic of British Appeasement in the 1930s."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 33, No. 2, pp. 148-181. doi:10.1162/isec.2008.33.2.148

- Ripsman, N. M., Taliaferro, J. W., & Lobell, S. E., 2016. *Neoclassical Realist Theory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Rosato, S., 2015. "The Inscrutable Intentions of Great Powers."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 39, No. 3, pp. 48-88. doi:10.1162/ISEC_a_00190
- Rose, G., 1998. "Neoclassical Realism and Theories of Foreign Policy." *World Politics*, Vol. 51, No. 1, pp. 144-172. doi:10.1017/S0043887100007814
- Russett, B., & Oneal, J. R., 2001. *Triangulating Peace: Democracy, Interdependence, and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s*. New York: W. W. Norton & Company.
- Schweller, R. L., 1994. "Bandwagoning for Profit: Bringing the Revisionist State Back In."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 19, No. 1, pp. 72-107. doi:10.2307/2539149
- Schweller, R. L., 2004. "Unanswered Threats: A Neoclassical Realist Theory of Underbalancing."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 29, No. 2, pp. 159-201. doi:10.1162/0162288042879913
- Schweller, R. L., 2006. *Unanswered Threats: Political Constraints on the Balance of Power*.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 Schweller, R. L., 2018. "Opposite but Compatible Nationalisms: A Neoclassical Realist Approach to the Future of US–China Relations." *The Chinese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Vol. 11, No. 1, pp. 23-48. doi:10.1093/cjip/poy003
- Shambaugh, D., 2012. Tangled Titans: Conceptualizing the U.S.–China Relationship. In D. Shambaugh, ed., *Tangled Titans: United States and China* (pp. 3-26). Lanham, MD: Rowman & Littlefield.
- Snyder, J., 1991. *Myths of Empire: Domestic Politics and International Ambition*. Ithaca, NY: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 Souva, M. 2004. "Institutional Similarity and Interstate Conflict." *International Interactions*, Vol. 30, No. 3, pp. 263-280. doi:10.1080/03050620490492213
- Taliaferro, J. W., 2001. "Security Seeking under Anarchy: Defensive Realism Revisited."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 25, No. 3, pp. 128-161. doi:10.1162/016228800560543
- Tang, S., 2008. "Fear in International Politics: Two Positions." *International Studies Review*, Vol. 10, No. 3, pp. 451-471. doi:10.1111/j.1468-2486.2008.00800.x
- Tang, S., 2010. *A Theory of Security Strategy for Our Time: Defensive Realism*. New York: Palgrave Macmillan.
- Tang, S., 2013. *The Social Evolution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Oxford, U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Walt, S. M., 1985. "Alliance Formation and the Balance of World Power."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 9, No. 4, pp. 3-43. doi:10.2307/2538540
- Walt, S. M., 2002. "The Enduring Relevance of the Realist Tradition." In I. Katznelson & H. V. Milner, eds., *Political Science: The State of the Discipline* (Centennial ed.) (pp. 197-230). New York: W. W. Norton & Company.
- Waltz, K. N., 1979. *Theory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Reading, MA: Addison-Wesley.
- Weeks, J. L., 2008. "Autocratic Audience Costs: Regime Type and Signaling Resolve."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Vol. 62, No. 1, pp. 35-64. doi:10.1017/S0020818308080028
- Weeks, J. L., 2012. "Strongmen and Straw Men: Authoritarian Regimes and the Initiation of International Conflict."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Vol. 106, No. 2, pp. 326-347. doi:10.1017/S0003055412000111
- Werner, S., 2000. "The Effects of Political Similarity on the Onset of Militarized Disputes, 1816–1985." *Political Research Quarterly*, Vol. 53, No. 2, pp. 343-374. doi:10.1177/106591290005300207
- Zakaria, F., 1992. "Realism and Domestic Politics: A Review Essay."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 17, No. 1, pp. 177-198. doi:10.2307/2539162
- Zakaria, F., 1998. *From Wealth to Power: The Unusual Origins of America's World Role*.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